

总量研究

日本“大停滞”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政策专题研究系列之十三

要点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会议均提到，“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而在“大停滞”时期，日本对财税体制做了诸多探索，总结来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消费税改革，另一条则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我们对上述两条线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以期我国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线索。

日本“大停滞”时期的 3 轮消费税改革

消费税开征前日本税制的整体特点是税制结构失衡。1989 年消费税的艰难开征以完善税制为目标，1997 年的消费税第一次增税宣示财政整顿的开启，2014-2019 年间的第二次增税是为实现特定目的（为社会保障提供财源）的大规模加税。

三轮日本消费税改革的目的不一；每次消费税开征或提高税率，都会迅速冲击后续几个季度的经济表现；以债务负担率作为跟踪指标，消费税改革并没有明显提升日本财政状况。

日本“大停滞”时期的央地财政关系：以活性化经济为导向

央地财政关系确定路径：

先确定各级政府的事务（财政事权）；根据确定的各级政府的财政事权，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根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确定税收的权限、税种划分以及相关财政收入的划分；根据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大致经历了三轮央地关系的调整，日本政府间财政关系有了不少的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从原来的“上下、主从”关系转变到“对等、协力”关系。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三轮央地关系调整：

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次改革（1993-2001 年），集中在行政和人事改革方面，税制改革的内容较少；

“三位一体”改革时期（2002-2007 年），包括地方发债权改革，着重于政府间财政结构的改变，在税源转让和削减转移支付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2008 年后改革持续推进，继续缩减中央干预、市町村合并节约财政资金、进行具体税种改革。

风险提示：

日本的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仅供参考，不能简单套用。

作者

分析师：张旭

执业证书编号：S0930516010001
010-58452066
zhang_xu@ebsecn.com

分析师：李枢川

执业证书编号：S0930521040004
010-58452065
lishuchuan@ebsecn.com

分析师：方钰涵

执业证书编号：S0930523020001
010-56513071
fangyuhan@ebsecn.com

联系人：秦方好

010-56513054
qinfanghao@ebsecn.com

目 录

1、 导言.....	4
2、 日本“大停滞”时期的消费税改革	4
2.1、 消费税开征前日本税制的整体特点：税制结构失衡	5
2.2、 日本大致经历了 3 轮消费税改革	6
2.2.1、 1989 年的艰难开征：以完善税制为目标	6
2.2.2、 1997 年的第一次增税：财政整顿开启	7
2.2.3、 2014-2019 年间的第二次增税：为实现特定目的（为社会保障提供财源）的大规模加税	8
2.3、 日本消费税改革的评价	9
3、 日本“大停滞”时期的央地财政关系：以活性化经济为导向	12
3.1、 日本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概况	12
3.2、 日本不同阶段央地财政关系改革梳理	17
3.2.1、 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次改革（1993-2001 年）	17
3.2.2、 “三位一体”改革时期（2002-2007 年）	18
3.2.3、 改革持续推进时期（2008 年后至今）	19
4、 参考文献	20
5、 风险提示	20

图表目录

图表 1：日本消费税改革的大致演变	4
图表 2：日本消费税改革前，全国税收中直接税占比超过 70%	5
图表 3：日本消费税改革前，税收中个税、法人税和间接税的占比情况.....	6
图表 4：日本消费税改革对整体税收收入的影响	10
图表 5：日本消费税改革时期税收和经济表现情况	10
图表 6：日本债务负担环比变化情况	11
图表 7：1989 年以来日本社保支出与消费税差值情况	11
图表 8：不同时期的日本消费税改革对税收、经济和财政状况的影响	12
图表 9：日本政府间事权划分	13
图表 10：日本财政支出划分的示意图.....	14
图表 11：日本国税、地方税的税种划分	14
图表 12：日本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情况.....	15
图表 13：日本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占比情况.....	15
图表 14：日本地方财政收入的构成占比情况.....	16
图表 15：日本三轮央地关系调整比较.....	20

1、 导言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2023 年财政工作会议中则提到，“要积极稳妥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如何理解“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目前官方没有明确的说法。我们认为，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后经历了长达 30 年的经济停滞，被称之为“大停滞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对国内财税体制做了诸多探索，总结来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消费税改革，另一条则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对上述两条线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以期我国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线索。

2、 日本“大停滞”时期的消费税改革

作为间接税的一种，日本的消费税（Consumption Tax）虽名为消费税，但与中国的消费税差别很大，是对日本国内销售的商品和服务按价格的一定比例普遍征收的一道附加增值税，其实质是一种具有间接税性质的多环节增值税（Value-added Tax）。

日本的消费税改革，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演变阶段，大致可以分为艰难开征（从无到有，初始引入税率为 3%）、结构性调整（包括引入地方消费税，税率提高至 5%）、增税（合计税率从 5%提升至 8%）以及进一步增税（合计税率从 8%进一步提升至 10%）这几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9 年竹下登内阁首次在日本开征 3%的消费税。第二阶段是 1997 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将消费税税率由 3%提高到 5%。第三、第四阶段是 2014 年安倍内阁则将消费税税率由 5%提高到 8%，并于 2019 年将消费税税率进一步提升至 10%。

图表 1：日本消费税改革的大致演变

适用税率	引入阶段 (1988-1997)	结构性调整阶段 (1997-2014)	大规模增税阶段 (2014-2019)	2019 年后至今
合计税率	3%	5%	8%	10%
中央税率	3%	4%	6.3%	7.8%
地方税率	0%	1%	1.7%	2.2%
经历时间	8 年	17 年	5 年	--

资料来源：引自蒋遐维(2020)¹，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2019 年日本将消费税税率上调至 10%，同时增加了一级低档税率，税率为 8%（中央、地方税率分别为 6.24%、1.76%），主要适用于食品、饮料与订阅报纸等日常必需品。

¹ 详见参考文献，后文类似处同。

2.1、 消费税开征前日本税制的整体特点：税制结构失衡

建立**体系完整、公平、稳定持续的税制**是国家财税体制构建的重中之重。“二战”后，1949 年，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普为首的日本税制调查团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方案——“夏普劝告”。上述税制的三个原则“体系完整、公平、稳定持续”也正是在“夏普劝告”中提出的。“夏普劝告”在二战后日本税制改革时基本被全面采用，在税制设计方面，日本实施了所谓的“夏普税制”，这是一种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收体系。此后，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为推动经济增长，日本也适时对税制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集中在减税政策和针对租税特别措施的定向减税激励政策，其中针对租税特别措施的减税政策，是日本政府根据产业政策需要，针对特定产业进行的定向减税，从而实现扶持重点产业优先发展的目的。这些减税政策对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若按照税收负担是否转移，可将某个税种划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其中直接税是指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由自己负担的税，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人税）等；间接税则是指纳税人纳税后可将税收负担转移他人的税，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整体来看，在 1989 年消费税正式推出之前，日本税制呈现出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整体结构，且直接税占比持续增加，间接税占比则持续下降，税制不合理的情况日益凸显。

第一个特点是，1989 年消费税引进前，日本税制呈现出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整体结构。战后日本税制建立后，1955 年，直接税在国税中所占比重是 51.4%，此后保持持续上升态势，至 1985 年上升至 72.8%。另外，若按税收征管主体不同，又可将税种划分为国税和地方税，其中国税指的是中央政府征收的税，地方税指的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直接税在全国税收中所占比重在 1965 年是 65.1%，此后同样保持持续上升态势，至 1970 年代超过七成，至 1985 年上升至 77.6%。

图表 2：日本消费税改革前，全国税收中直接税占比超过 70%

年度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国税	直接税	51.4	54.3	59.2	66.1	69.3	71.1	72.8
	间接税	48.5	45.7	40.8	33.9	30.7	28.9	27.2
国税与地方 税合计	直接税	--	--	65.1	70	74.1	75.8	77.6
	间接税	--	--	34.9	30	25.9	24.2	22.4

资料来源：引自余蔚鹏&吴宇(2004)，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

但日本引入消费税之前，税制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也使得“体系完整、公平、稳定持久”的“夏普税制”不断遭受蚕食、修正，日本进一步的税制改革也自然被推上日程。这些不合理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个人所得税负担偏重。从税率来看，“二战”后至 1987 年 9 月前，日本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收制度，其纳税等级共 15 级，税率为 10.5%-70%，而这只是国税的范畴，而如果再加上地方税，适用于个人所得的最高税率将达到 90%左右²。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渐提升，个税又实行累进税制，个税在全体税收中占比则持续提升。1955 年，日本个税在全体税收中占比 29.8%，此后

² 参见《战后日本税收制度改革及其前景分析》（余蔚鹏&吴宇，2004）。

稍有下降，而至 1970 年则升至 30% 以上，至 1985 年则接近了 40%。偏高的个税负担，使得日本居民不公平感日益加深。

二是法人税税率偏高，影响企业竞争力。战后日本的法人税收入一直较高，给企业造成了较为沉重的税收负担。1955 年，日本法人税在全体税收中占比为 20.5%，此后至 1970 年则升至 33%，至 1985 年则回到 30% 左右水平。而从实际税率（法人税、法人事业税等税率的加权平均数）来进行比较，1985 年日本与美国分别为 52.9% 和 51.2%，差别并不大。但如果考虑到美国 1981 年税收制度改革中引入的加速折旧等措施后，税率对比就变成了 51.6% 和 32.3%，日本企业法人税率比美国高将近 20 个百分点，这无疑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³。

图表 3：日本消费税改革前，税收中个税、法人税和间接税的占比情况

年度	直接税				间接税	合计
	个人所得税	法人税	其他	合计		
1955	29.8	20.5	1.1	51.4	48.6	100
1960	21.7	31.8	0.8	54.3	45.7	100
1965	29.6	28.3	1.3	59.2	40.8	100
1970	31.2	33	1.9	66.1	33.9	100
1975	37.8	28.5	3	69.3	30.7	100
1980	38.1	31.5	1.5	71.1	28.9	100
1985	39.4	30.7	2.7	72.8	27.2	100

资料来源：引自余蔚鹏&吴宇(2004)，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

2.2、日本大致经历了 3 轮消费税改革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 1989 年日本消费税开征前，日本的税制结构存在直接税占比高，而间接税占比偏低的情况，因此日本的消费税改革首先即是以完善税制为导向，但在消费税引入后，日本经济很快出现泡沫破灭，而之后，日本消费税改革则在财政整顿和活性化经济两个目标上不断徘徊，但财政整顿是主要方向。

2.2.1、1989 年的艰难开征：以完善税制为目标

日本增值税的开征过程一波三折，经十年左右的尝试才在 1989 年正式通过法案。而早在 1979 年，大平正芳内阁会议即决定，引入“一般消费税”，设定为多环节征收的增值税，并将税率定为 5%，且不对食品课税。这时的“一般消费税”设计与目前日本推行的消费税比较类似。但是法案遭到居民和企业的强烈反对。而在当年 10 月大选后，由于议席大量减少，大平正芳内阁表示放弃该计划。

1986 年，为了改革自“夏普劝告”以来建立的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结构，中曾根内阁公布了税制调查会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改革税制结构的方案，即对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进行减税，重新调整利息税，并引入“一般消费税”。另外，中曾根内阁政府吸取之前大平正芳内阁关于“一般消费税”的经验教训，从税收中立、纳税人互相制约、明确税负转移等目的出发，将“一般消费税”改称为“销

³ 参见《战后日本税收制度改革及其前景分析》（余蔚鹏&吴宇，2004）。

售税”，并于 1987 年向国会提交了“销售税法案”。但是该法案同样遭遇强烈反对。

之后上任的竹下内阁提出了“根本改革税制结构的方针”，要求建立所得、消费、资产等均衡且稳定的税制。为此，竹下内阁拟引入多环节的一般消费税，并将税率设定为 3% 的单一税率，即增值税作为“一般消费税”开征。1988 年 12 月，消费税法的立法法案通过，拟定于 1989 年 4 月正式实施。至此，争议已久的日本版增值税——消费税终于拉开了开征的帷幕。为了推动消费税的开征，竹下内阁最大程度上考量了纳税义务人（企业家和经营者）对于这一法案的接收程度，在开征消费税的同时废除了税基范围有重叠的“物品税”，同时还废除了诸如纸牌税、砂糖消费税、入场税以及通行税等个别消费税。另外，竹下内阁采取了征收消费税与降低所得税相配合的混合策略，最终才推动了消费税的开征。根据测算，1989 年日本引进消费税时，虽然表面上家庭经济负担增加了 5.4 万亿日元，但是由于取消物品税等减免税措施，家庭实际经济负担只增加了 3.1 万亿日元。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日本消费税的开征，主要是为了完善税制结构，当时日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尚不太突出。

2.2.2、1997 年的第一次增税：财政整顿开启

日本在 1989 年消费税开征后至 1994 年，日本根据当时消费税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消费税进行了一些修补，例如 1991 年通过的修正消费税法法案，其契机是即是要解决消费税的溢税、运用税款获益和累退性等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停滞。1992-1994 年日本经济增速分别只有 0.9%、0.2% 和 -4.3%。为促进经济走出低谷，日本政府连续实施了扩张型财政政策，政府支出持续攀升。而为了支撑日益膨胀的支出，不得不重新依赖于国债的增发。1997 年，日本政府国债余额与 GDP 的比重（债务负担率）为 47.6%，而 1989 年这个指标仅为 38.7%。日本这一时期试图通过通过消费税改革增加税收收入，从而达到削减债务比重，缓解财政债务压力，实现财政重建的目标，也即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消费税改革的目标从最初的完善税制过渡到财政整顿，当然，在消费税改革过程中，同样面临活性化经济的压力。

1994 年 6 月，村山联合内阁经过艰难的磋商与协调，于同年 9 月 22 日提出了一个税收制度改革大纲，主要内容包括：

- 1) 个人所得税、个人住民税的减税。进行总额达 5.5 万亿日元的个人所得税、个人住民税减税，包括通过提高课税下限等方式；
- 2) 提高消费税率。预定于 1997 年 4 月 1 日将消费税率提高到 5%；
- 3) 废除消费让与税。从消费税收入中取出五分之一用于设立地方消费税，经过这样分配后，5% 的消费税中，4% 归中央，1% 归地方。

同年 11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包含税收制度改革大纲内容的《税收制度改革关联四法案》，从而使得这次消费税率提升以及引入地方消费税得以实施。1997 年 4 月，依据先前通过的税收制度改革计划，消费税率被正式提高到了 5%。这次以财政整顿为目的的增税，尽管日本政府向低收入家庭临时支付了 1000 亿日元的补助金，但消费税却增加了 5.2 万亿日元。另外，受年金、医疗、保险等改革影响，日本家庭的实际负担增加了 8.5 万亿日元。受此影响，1997 年度日本

民间消费支出的大幅度降低。1997 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经济也开始呈现明显恶化的趋势。1997 年，日本经济增速录得 1%，而 1996 年经济增速则是 3.1%，此后的 1998、1999 年，日本经济增速则分别录得-1.3%和-0.3%，在经济出现停滞的同时，通缩也开始逐渐生根⁴。

2.2.3、2014-2019 年间的第二次增税：为实现特定目的（为保障提供财源）的大规模加税

1997 年日本消费税税率提升并未扭转财政状况恶化、政府的债务余额持续上升的态势。这使得日本社会产生了单纯靠传统的财政金融政策很难提振经济的观念，并认为，要想恢复经济景气，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改革。此外，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社会开始面临一系列经济之外的问题，如社会少子老龄化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问题，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等等。

2000 年后，小泉内阁在进行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对税收制度改革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一定的税制调整来应对经济的不振。2002 年 3 月，日本经济财政政策委员会讨论了税收制度彻底改革的大致内容和时间表，并将税收制度一向遵循的“公平、中立、简要”原则改为“公平、活力、简要”，特别强调了税收制度的改革要以经济目标的实现为主要目的。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日本税制改革，更多的是以活性化经济为目的。因此，尽管 2003 年 6 月 17 日的政府税制调查会的报告为后续税制改革指明了大致的方向，其中一条就包括要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两位数，但提高消费税税率与活性化经济的目标相冲突，因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消费税税率被稳定在 5%。

但是，在少子老龄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长期停滞的大背景下，社会保障改革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2008 年 1 月，仍属于自民党的福田内阁设立社会保障国民会议，并于同年 11 月提交了一份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加强社会保障功能的报告。

2009 年 9 月，日本政坛出现政权更替，民主党政权根据选举承诺，开展了各项政策改革，并于 2012 年 2 月会议制定了“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

2012 年 6 月，民主党、自民党、公明党三党就“推进围绕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意愿”达成一致，均支持在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过程中，将消费税税率从 5%提高到 10%，其中增税部分的五分之一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其余五分之四用于社会保障项目的稳定与发展。此次消费税法改革与增税是以支援社会保障支出与发展为目标推进的，与过去几次消费税修法相比，日本各界支持消费税法增税的反对声明明显减少，呼声也更高。这次税制改革法案，消费税税率的提高“分两步走”，即 2014 年先将消费税率提高至 8%，然后在 2015 年将税率提高至 10%。不过，消费税的税率提高附带了一定的条件，即消费税率调整须根据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确定，并明确消费增税的部分可作为东北、关东大地震重建的重要财政来源，试图以此削减增税阻力与强化增税的合理性。

此后的 2013 年 12 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关于为确立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的法律》，并于 2014 年 1 月设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本部。2014 年 4 月 1 日，消费税率如期提高到 8%。但 2014 年日本提高消费税税率以后，消费税收入乃至整体税收收入增长缓慢，其中 2016 年税收收入不增反降。这使得原定在

⁴ 参见《战后日本税收制度改革及其前景分析》（余蔚鹏&吴宇，2004）。

2015 年将税率提高至 10% 的举措一再推迟至 2019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消费税率从 8% 提高到 10%，使 2012 年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告一段落。日本政府也相应提出“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改革，提出将增加的消费税（即 5% 部分）全部用于社会保障领域。

2.3、日本消费税改革的评价

我们从税制改革的目的，对经济整体的影响，以及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线索来对日本消费税改革进行简要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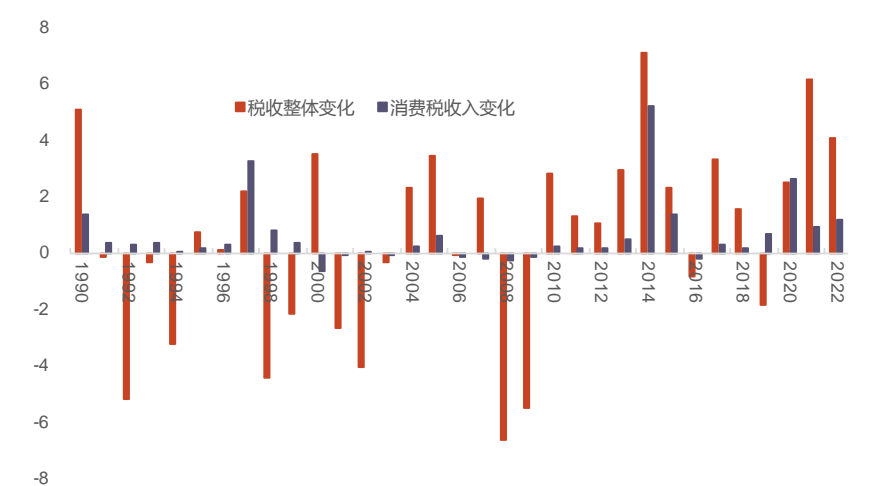
第一个方面是上述几轮日本消费税改革的目的。从功能上来说，税制改革大致有 3 种不同的目标：汲取财政收入（即包括广义地汲取财政收入，也包括一些特定的目的，如财政整顿、为社保保障支出筹集资金等），活性化新经济以及完善税制。从梳理来看：

- 1) 日本在 1989 年开征消费税时，日本经济处在泡沫破灭的前夜，经济增速相对较高，税收也较为充裕，因此这时开征消费税的目标相对比较单一，更主要是针对之前直接税偏高而间接税偏低的税制结构失衡的问题，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 2) 1997 年日本第一次消费税税率提升是在“经济泡沫”破灭后，且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日本经济严重受挫。所以从经济方面，很难找到提高消费税率税率的支撑。提高消费税率，主要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为提振经济，日本政府连续实施大规模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导致其财政支出不断攀升。但同期，税收收入又因经济景气低迷整体呈下降之势，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不得不通过发行国债来填补财政缺口，这就使得日本的债务规模持续增加。因此，这一时期提高消费税率，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财政整顿来控制债务。
- 3) 2014-2019 年日本大规模提高消费税率的背景是其财政困境更加严重。日本的财政赤字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迅速恶化，同时又面临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以老年人作为主要支付对象的年金、医疗、护理、保险等社保保障相关支出持续上升，因此这一时期在短期内快速提高消费税率，主要的目的是为社会保障筹集资金。而通过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日本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稳定。

第二个方面是上述几轮日本消费税改革对同期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的消费税改革主要的时点，分别是 1989 年 4 月正式实施消费税（税率为 3%），1997 年 4 月将税率为 3% 提高到 5%，2014 年 4 月消费税率提高到 8%，以及 2019 年 10 月，消费税率从 8% 提高到 10%。可以看到，当开征或者提高消费税率时，当年的年度税收收入增速将出现脉冲式的提升，第二年税收收入同样能维持不错增速。但同期经济则将快速转向低迷。1989 年 4 月开征消费税后，1989Q2、1989Q3 日本经济增速分别为 4.7%、4.3%，均较 1989Q1 下降超过 2 个百分点。1997 年 4 月将税率为 3% 提高到 5% 后，1997Q2、1997Q3 经济增速分别为 0.9%、0.8%，而 1997Q1 的经济增速则是 2.8%，并且在当年 4 季度，经济增速直接掉入负值区间。2014 年 4 月消费税率提高到 8% 后，2014Q2、2014Q3 经济增速直接从 Q1 的 2.9% 转负，分别为 -0.1%、-1.1%。2019 年 10 月消费税率从 8% 提高到 10% 后，2019Q4 经济增速从前一季度的 0.6% 直接掉至 -2%。梳理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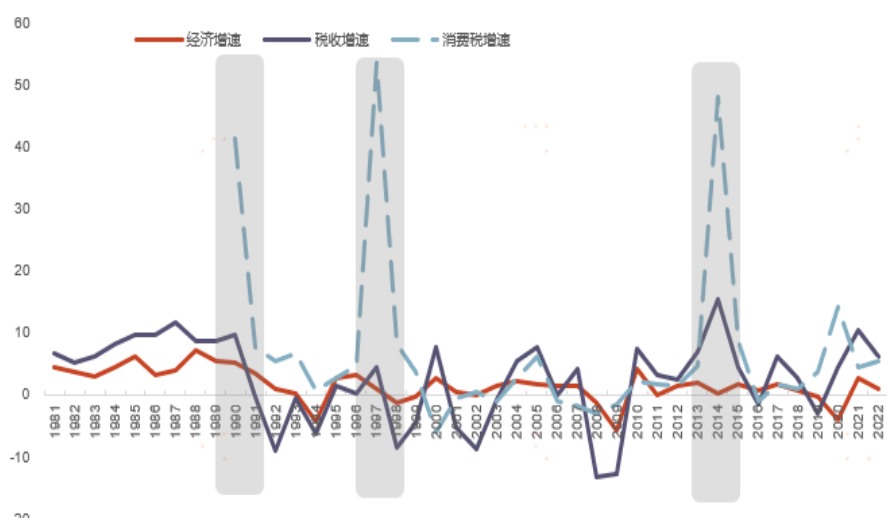
每次消费税开征或提高税率，都会迅速冲击后续几个季度的经济表现。另外，消费税开征或提高消费税税率还对日本原本就很疲弱的通胀产生冲击。

图表 4：日本消费税改革对整体税收收入的影响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描述的当年消费税和税收整体收入与上年变动的值，单位为万亿日元，统计截至 2022 年

图表 5：日本消费税改革时期税收和经济表现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

第三个方面是上述几轮日本消费税改革时期日本财政状况。我们以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与 GDP 的比值）作为衡量财政健康状况的指标。可以看到，1989、1997、2014 年三次开征或提高消费税税率时（2019 年提高消费税率时间较晚，且后续有疫情冲击，因此没有纳入考察），当年的债务负担率分别为 38.7%、47.6%和 147.9%，开征或提高消费税税率当年及后续两年，日本政府年度债务负担率较消费税改革前一年度分别变动-4.2（三年分别为-1.7、-1.9、-0.6）、+17.1（三年分别为+2.2、+7.6、+7.3）、+7.3（三年分别为+2.8、+1.0和+3.5）个百分点。除了 1989 年开征消费税后政府债务负担率稍有下降后，后续的 1997、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65102312003011111>